

◀（上接 3 版）

的关系问题。

之所以称之为“跨文化角度”，是因为我们中国思想上特别有一个“动机揣摩学”，而一向只重外部效验、自以为科学无比的西方思想界则大大欠缺了这一块“智慧宝地”（所以他们今日才对消除主体性问题不遗余力），以至于完全忽略了人类生存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动机、思想、言论、行动，此四者之间的“因果关联性”问题。因果作用并非只存在于外部行为之间，也并非是有外部行为才能够有条件“推测”动机（如法律案件推理一般）。中国的仁学乡愿学是成立于2500年前的，专门关注此隐蔽而微妙的地段，而乡愿辈则最善于在此模糊地段进行文辞性操作和“艺术性创造”。之所以魏晋名士和现代朦胧诗哲最称可疑，就是因为其“真诚性”不易察验，而此辈最善于操弄这一地段以达哗众取宠之效果。

例如，海德格尔，劣行昭著如是，而各路哲学家们多因其所谓“哲学贡献”而直接、间接地予以宽谅，以至于他敢于在战后利用新社会环境的安全性而继续“卖弄”其对种族主义之潜伏的“忠贞性”。于是，在本书中我们看到，作者一方面诚实客观地暴露其崇拜权势和性格伪善的一面；另一方面又忙着顺应西方哲学界之“共同规范”，而仍然称其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关于什么是“伟大”，在西方思想史上也是一个一直没讲清楚的概念），以至于还将他与黑格尔并列为哲学两高峰。这一结论又与作者本人的分析哲学训练部分很不协调，却也反证了西方学人的论断逻辑“一致性”只能停留在技术性层次上。这样一种只从外部影响力大小评论思想学术之“高低”的标准，我们中国学人能不能照搬照用？这种思想的伦理性和认知的谬误性相互分裂的严重现象，应当被视为

当然而自然（如果取职业化功利主义，当然如是），还是应该被视为必须厘清的关键之所在（如果取科学真理原则）？这难道不是把哲学话语完全当成了读朦胧诗一类的文艺游戏了吗？正是从此一系列现代西方哲学思想的历史表现中，我们可进一步察觉：“哲学”已到了必须予以科学化改进的关键时刻了。我们能够再容忍一些国际名人（在相应国人的簇拥下）利用其“玄而又玄”的语言游戏来忽悠我们中国青年一代宝贵精神之未来发展吗？

归根结底，现代西方哲学界的矛盾、混乱、困惑现象，其原因的核心之核心在于：西方伦理学思想史的结构本身出了问题。从技术性角度看，西方哲学和西方伦理学间的矛盾关系问题源远流长，却也于今为烈（时代的吊诡是：科技工商越理性化，人文学术反而就越非理性化）。再进而言之，这是西方形上学和本体论与伦理学的关系之间存在的历史性大问题。因此我们才会一方面看到胡塞尔的逻辑“原教旨主义”的伦理学推演的失当性（所谓西方“科学危机”论），他的逻辑化思想根本不能准确看出20世纪30年代欧洲即将到来的“暴风雨”的真实原因，竟然还打算从自然科学认识论角度对此人际关系冲突问题加以解决；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战后莱维纳所谓伦理学本位主义的提出，企图进一步用本体论来混乱伦理学的真实结构。感谢作者不客气地指出：莱维纳根本不进行“论证”，而是任意抛出他的“诗学格言”。

或许，归化法国后的东欧裔的莱维纳是受到法国名士派风气的影响而选择此类“创造性”话语，而我们更应关注那些处心积虑地要与人类理性为敌者。海德格尔说他的《存在与时间》的目的是要“把胡塞尔的脖子掐断”。他至于如此妒恨其恩师吗？不，他要“掐断”的其实是“理性的脖子”，他处心积虑地

是要摧毁理性基础，以便为其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的非理性霸权事业制造理论基础。是的，现当代西方思想界引以为傲的20世纪“非理性主义两大师”，正是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有趣的是：他们两人都是主要企图通过瓦解胡塞尔学的理性主义而宣扬其非理性主义的（所以即使从现象学的“胡塞尔中心论”角度看，本书作者也有理由将两人纳入“现象学思潮”）。两个人都是反向地依赖胡塞尔研究成果而追求反胡塞尔理性主义效果的（关于在技术上两人如何取利于胡塞尔文本的，已有相当多论述），而其各自宣扬非理性主义的动机又非常清晰地是为了从根本处颠覆人类伦理学的基础。

哲学人文学科需要的是怎样一种“科学化”？

以上谈了这么多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负面表现，读者不要误解了我的用意。我不仅不是要贬低研读西方哲学的价值和必要，反而是要强化对其研习的必要。现当代西方哲学成果都是我们进一步跨学科、跨文化进行人文学科理论建设的有用材料。重要的是：要视之为“材料”，而不必视之为现成的楷模。为此，面对研究者的是更高的要求。因此，哲学读解的效果应该是：首先读解文本的正反两方面意思，按照不同的标准和目的加以拆解利用，特别是由之发现主要问题所在，最后提升、扩大自我求知的层次、范围和深度。这也是我翻译此书的目的所在，并特别希望对于广大青年读者们，能够有所启发。任何优秀思想都只是我们自身创造性前进的一种助力和资源，作为我们与之“相互切磋”的理性对话手段，而绝不是

供我们进行盲目崇拜的媒介。

最后，通过这部现代西方哲学“导论”，我们还要进一步思考这样一个十分简单却连新世纪一些中外大知识分子都视而不见的关键性认识论问题：古典哲学作为人类文明期知识总体（兼含自然与社会）的形式，后来衍生出自然科学，直至几百年前近代自然科学将传统哲学彻底排除于知识系统之外，自然科学自此以后才能够突飞猛进。时至今日，如果数学自然科学的任何领域（科学史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不能纳入数学自然科学本身）再有人用传统或现代哲学的语言和方式从事研究，即会被立即排除于“科学性运作”之外。那么，为什么现代数学自然科学与传统哲学的分裂要达到这样的彻底程度才叫作符合“科学性”，而现代人文学科则可以仍然与传统人文学术（自然包括传统哲学）融为一体、难解难分呢？难道现代人文学科就没有彻底反思古今学术方向、方式分界的必要性吗？数学自然科学要科学化，哲学人文学科就不需要“科学化”了吗？我们哲学人文学科理论工作者，也有必要反思一下这样一个最根本性问题。

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古今中外思想大杂烩的学术形式——这种大杂烩形式却在人文学术职业制度化安置下获得了研究程序的实用秩序性，于是在思想理论层次上的杂乱关系，在教学制度化秩序内却获得了表面上的条理性——有没有一个进一步“科学化”的问题呢？如果19世纪的古典实证主义、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乃至晚近的认知科学所主张的“科学性”都属于简单化的初级现代化的处理，如果这个科学化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化，那么要不要研究一下哲学人文学科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科学化”的问题呢？当代符号学就是要思考和试图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研究现代西方哲学，不是找到什么新理论、新思想的现成新“归宿”，而是要促使我们深入研究和认真批评。读者如果把它仅当作（或仅能当作）职业化工具，那当然就什么也不需再进一步思考了。大家都在谈着同一批人物和话语，却在想的、做的、准备的方面，非常不一样。

（本文为《现象学：一部历史的和批评的导论》译者序，发表时有删节，大小标题为编者所拟。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学人在讲

◆中美洲的死与生

主讲：娜塔莉娅·莫拉·塞古拉(Natalia Moragas Segura，巴塞罗那大学历史与考古系教授)

时间：2017年8月24日（周四）19:00—21:00

地点：上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

◆从想象到偶像

主讲：郑岩(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时间：2017年8月25日（周五）14:00

地点：首都博物馆地下一层多功能厅

◆朱子的“格物游艺”之学与“中和”之美

主讲：张毅(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时间：2017年8月26日（周六）9:30—11:30

地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琼楼二层

◆音义关系与上古文献解读

主讲：洪波(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时间：2017年8月27日（周日）14:00—16:00

地点：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学津堂

◆明代书法谈

主讲：刘一闻(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研究员)

时间：2017年8月27日（周日）14:00—16:00

地点：上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

◆世界文明与世界宗教

主讲：卓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时间：2017年9月2日（周六）14:00—16:00

地点：上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

◆生涯与观念:明代吴门与同期意大利画家比较

主讲：万木春(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

时间：2017年9月9日（周六）14:00—16:00

地点：上海博物馆观众活动中心

◆北京民俗的“远”与“近”

主讲：岳永逸(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教授)

时间：2017年9月10日（周日）14:00—16:00

地点：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学津堂



《现象学：一部历史的和批评的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及其作者爱尔兰现代哲学史家德尔默·莫兰

